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21

梁启超文献学思想研究

LIANGQICHAOWENXIANXUESIXIANGYANJIU

◇ 彭树欣 /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江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出版资助(部分资助)

梁启超文献学思想研究

彭树欣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文献学思想研究 / 彭树欣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5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21辑 / 李兰芳主编)

ISBN 978-7-80206-926-8

I. ①梁… II. ①彭… III. ①梁启超 (1873~1929)

—文献学—思想评论 IV. ①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5677 号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21辑·梁启超文献学思想研究

著 者: 彭树欣

责任编辑: 茹新平

版式设计: 莘海琴

责任校对: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4

传 真: 010-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26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10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6-926-8

定 价: 300.00元 (全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摘要

梁启超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文献学家之一，有着极为丰富的文献学思想，对 20 世纪文献学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国文献学的发展。本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综述前人对梁启超文献学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第一章：梁启超是“文献学”和“中国文献学”这两个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其“文献学”概念的提出和阐释，一方面与其一生良好的学术训练有关，另一方面则是 20 世纪初期文化思潮的产物。梁氏首次对“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阐释，并确立了“文献学”研究的五大原则和三个标准。梁启超“文献学”概念的提出和阐释，对 20 世纪中国文献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影响了郑鹤声兄弟和张舜徽的文献学观念以及他们的文献学学科建构，标志着“现代”文献学的萌芽。

第二章：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目录学的开山鼻祖，他对目录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导读书目上的发展和影响。梁氏继承了过去导读书目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强化了其传播功能，使其成为近现代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从而促进了 20 世纪导读书目的繁荣。二是对佛经目录研究的开创性贡献。梁氏是佛经目录学史

最早的梳理者，他提高了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其研究对目录学家姚名达产生了较大影响。三是对近现代书目分类体系的探索和创造（第三方面学者论之甚详，本书着力于前两个方面）。

第三章：梁启超是现代辨伪学的开创性人物。梁氏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辨伪学的成就，一方面受到 20 世纪疑古思潮的影响，既在辨伪学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又进一步形成了系统的辨伪学理论，奠定了现代辨伪学的基础。他的辨伪学研究，促进了辨伪学从古代的重辨伪实践向现代的重理论建构的转型。

第四章：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的一批借用西学进行文献整理和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较为全面地运用了西学观念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从其西学运用的广度来看，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学者。其方法以及成果作为一种“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20 世纪文献学研究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第五章：梁启超首次提出了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普及化发展方向。梁氏是近现代文化普及运动的重要推动者，这一运动促使他提出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普及化问题，并付诸实践。其普及化方向的探索影响了 20 世纪文献学的发展走向，使文献学在重视专深研究的同时，出现了普及化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近现代；梁启超；文献学；目录学；辨伪学；西学；普及化

Abstract

Liang Qi—chao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terature philologist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His researches on literature philology obtained the great academic achievement that played a significant and instructive rol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philology during the century,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hilology. The book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In introduction, based on the main researches on Liang Qi—chao' s literature philology, the disseration proposes the key question, the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ology.

In chapter 1, Liang Qi—chao was the initiator who put forward literature philolog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philology. He was able to illustrate literature philology, which was related to being trained academically in his life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this was the outcome of the cultural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20th century. Liang Qi—chao expounded the content, scope and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phil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He outlined the five principles and three standards of literature philology. Liang' s viewpoints on it guid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hilology,

affecting the conception and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philology of Zheng He—sheng and his brother and Zhang Shun—hui, together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philology, symbolizing the sprout of modern literature philology.

In chapter 2, Liang Qi—chao was the first one who initiated Chinese modern bibliography. His study on bibliography is the specific displaying of his conception of literature philology. The dissertation discusses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mainly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hi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to introduction bibliography. Liang Qi—chao inherited the good tradition of the past, enhanced its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made it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of communicating the modern culture, thus made it flourishing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other is his initiating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n Buddhism bibliography. Liang Qi—chao first combe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ibliography and upgraded Buddhism bibli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His research also had great influence upon Yao Ming—da, a bibliographer in China.

In chapter 3, Liang Qi—chao was one of the initiators in modern Distinguishing Pseudoscience. Distinguishing Pseudoscience also was part of his literature philology. On one hand, Liang Qi—chao inherited the achievement of ancient Distinguishing Pseudoscience, on the other hand, he was influenced by the current suspecting classical literature. He obtained certain achievement in practice, and contributed to form a systematic theory, which laid a basis for modern Distinguishing Pseudoscience. His study of Distinguishing Pseudoscience helped shifting the emphasis on paractice to theory—forming.

In chapter 4, Liang Qi—chao was one of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who firstly introduced Western learning and used it study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The usage of the methods of Western learning was the important part of his literature philology. He made full—scale use of the conception and method of Western learning to study ancient literature, and produced many valuable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He went beyond any scholars at his times, especially in the span of using it to study mordern literature. As a sort of paradigm, his method and research results, to a certain degree,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logy of 20th century from classical to modern.

In chapter 5, Liang Qi—chao put forward the universal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n the research of literature phil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was also important content of his conception of literature philology. Liang Qi—chao was the important man who pushed forward the movement of culture universality in modern times that made him bring out and solve the question of universality about literature philology. His explor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universality had affect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hilology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made literature philology change its development mode from single direction to multiple direction.

Key words: modern; Liang Qi—chao; literature philology; bibliography; Distinguishing Pseudoscience ; Western learning; multiple direction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梁启超的“文献学”概念	15
第一节 梁启超文献学产生的学术渊源和文化背景	15
一、梁启超的学术渊源和学术训练	15
二、梁启超文献学产生的文化背景	22
第二节 梁启超：“文献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和阐释者	29
一、“文献学”和“中国文献学”概念的提出	30
二、梁启超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及研究意义	33
三、梁启超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	38
四、梁启超文献学研究的三个标准	48
第三节 梁启超“文献学”概念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53
一、梁启超“文献学”概念在文献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53
二、梁启超“文献学”概念对郑鹤声兄弟的影响	55

三、梁启超“文献学”概念对张舜徽的影响	60
第二章 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	67
第一节 梁启超在导读书目上的发展和影响	68
一、梁启超以前导读书目的发展概述	68
二、文化传播与梁启超的导读书目	72
三、梁启超导读书目的影响	93
第二节 梁启超对佛经目录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95
一、佛经目录学史的最早梳理者	95
二、梁启超对佛经目录理论的总结	101
三、梁启超佛经目录研究的影响	106
第三章 梁启超的辨伪学思想	109
第一节 梁启超辨伪学产生的学术背景	109
一、梁启超以前辨伪学的发展概述	110
二、疑古思潮的兴起与现代辨伪学的发展	117
第二节 梁启超辨伪学的成就	124
一、梁启超辨伪实践的成就	125
二、梁启超对前人辨伪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136
第三节 梁启超辨伪学理论的影响	150
一、梁启超对辨伪学理论研究的影响	151
二、梁启超对辨伪学史研究的影响	157
第四章 西学与梁启超的文献整理方法	160
第一节 梁启超的西学接受、传播及其西学思想	161

一、梁启超对西学的接受和传播	161
二、梁启超的西学思想	165
第二节 文献整理方法的改进	
——梁启超的文献整理对西学观念和方法的运用	173
一、西式著述体例与梁启超的文献整理	174
二、文化地理学与梁启超的文献整理	178
三、逻辑学与梁启超的文献整理	186
四、中西比较方法与梁启超的文献整理	190
五、梁启超文献整理的其他西学观念和方法	197
第三节 梁启超的文献整理方法与文献学研究的现代	
转型	203
一、西学的输入和引进与文献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203
二、梁启超的文献整理方法对文献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的意义	206
第五章 梁启超文献学的新走向	212
第一节 古代文献学发展的两种主要走向	212
一、文献整理和研究的专精之路	213
二、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博通之路	217
第二节 文献整理和研究普及化方向的出现	220
一、近现代的文化普及运动	220
二、文化普及：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新走向	224
第三节 梁启超对文献整理和研究普及化方向的探索及其	
意义	226
一、梁启超的文化普及观念和活动	226

二、梁启超对文献整理和研究普及化方向的探索	235
三、梁启超的新探索对文献学发展的意义	246
结 语	249
主要参考文献	252
附录：张舜徽对梁启超的著作或文章的引用情况表	266
后 记	276

绪 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①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一生涉猎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教育学等十几个领域，并在学术上都有所建树，在文献学领域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中国文献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文献学在 20 世纪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受到西方现代学术和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而发生嬗变。当然，文献学的发展也有其内在的理路，以往时代的文献学，尤其是清代文献学，是 20 世纪文献学发展的重要学术资源。可以说，20 世纪文献学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然而，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献学的研究非常薄弱，至今没有出现一部 20 世纪文献学史或“现代”文献学史^②。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也只写到章太炎和王国

① 一般的论者，往往将梁启超当作近代人物来论述，其实他晚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现代（本文采用通行的时代划分法，现代指 1919—1949 年这一时间段），因此本书在提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时，采用“近现代”的时间概念。

② 本书使用的“现代”文献学，强调时间概念，是指在现代（包括当代）产生的文献学，与通常使用的学科意义上的现代文献学内涵不同，现代文献学是与古典文献学相对的一个概念，故给“现代”二字加上引号，以示两者的区别，下同。

维便嘎然而至。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不是笔者一人所能承担的，但是如果要找一個切入口，梁启超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梁启超的文献学活动开始于20世纪前后，并持续到这一世纪20年代末期，这正是20世纪文献学的发轫期。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文献学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具有转型时期的特点，对20世纪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通过这一个案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把握20世纪文献学的发展特点及其走向。

梁启超文献学的成就涉及文献学观念、目录学、辨伪学、图书馆学以及具体的文献整理和发展思路等。对这些内容，有些方面前人已有一定的研究，有些方面还比较欠缺。现有必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便进一步深入研究。前人对梁启超文献学的研究大致从五个方面展开，即文献学的整体研究、目录学研究、图书馆学研究、辨伪学研究、比较研究。

“文献学”这一概念是由梁启超首先提出来的。有学者指出：“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全祖望亦私淑宗義，言文献学者宗焉。’三年后，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初史学之建设’一章中又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梁启超的这一观点，代表了后来许多学者的共同看法。”^①这说明梁启超在20世纪文献学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有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文献学的创立和发展，始于“新史学”的代表梁启超。^②但以上只是片断的论述，从总体上来论述梁启超的文献学成就主要有两篇论文和一篇博士论文，即罗欣的《梁启超对文献学的贡献》（《高校图书馆工作》，1992年第4期）、张永瑾的《论梁启

① 王余光等：《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图书与情报》1999年3期，第12页。

② 张家璠、黄宝权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

超在文献学上的贡献》(《淮北煤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吴铭能的博士论文《梁任公的古文献思想研究初稿——以目录学、辨伪学、清代学术史及诸子学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1997年)^① 罗文从图书馆学的角度，分别从文献分类、目录、辨伪以及辑佚等四个方面简要地介绍了梁启超的文献学成就。在分类上，主要介绍了梁氏的《西学书目表》及其对史学著作的分类；在目录方面，主要介绍了梁氏的《西学书目表》、《东籍月旦》和《最初应读之书》及《学要十五则》这几种目录学著作的主要内容；在辨伪方面，主要总结了梁氏的辨伪学方法；最后，指出了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关于辑佚方面的论述。罗文主要是介绍性的，缺乏深入的总结和评判。张文从新的文献史、古籍整理的理论与方法、目录学上的巨大贡献三个方面总结了梁启超的文献学成就。张文认为，梁氏在历史文献的研究上，以进化论为指导，既对“中国之旧史”进行了全面批评，又积极构想新史体，并付诸实践；在古籍整理方面，既摒弃了“乾嘉诸老”繁琐考证的不良风气，又发扬其“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并在校勘、辑佚和辨伪的方法、途径上多有创见；在目录学领域，冲破了传统“四分法”的樊篱，开创了新型的图书分类体系和灵活多样的著录方法。吴文则对梁启超的古文献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该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总结了梁启超的古文献思想：一是梁启超的文献学研究，即第二章“梁任公目录学思想研究”和第三章“梁任公的古书辨伪学”；一是学术史研究，即第四章“梁任公清代学术史研究”、第五章“梁任公与先秦诸子的研究”和第六章“梁任公与胡适论学的时代意义”。第二章论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肯定了他提出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命题；指出他对目录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延续

^① 2001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梁启超研究丛稿》系由该文修订而成，该文的正文成为此书的上篇，该文的附录成为此书的下篇，并增加了三个附录。

了宋以来的“书录解题”的传统以及对佛经经录的阐扬和对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第三章论梁启超的古书辨伪学，指出了他与“疑古学派”的微妙关系，考察了其辨伪理论和实践；并对其辨伪理论进行了反思，既肯定其成就，又指摘其缺失。而第四至第六章实不属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研究范围，故在此不论及。

对梁启超文献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局部研究上，即对其目录学和图书馆学的研究（目录学、图书馆学以及辨伪学等可视为是文献学的组成部分）。其中，对其目录学的研究论文 30 多篇，对其图书馆学的研究论文 20 多篇。^① 尽管这两类研究论文数量较多，但研究成绩主要集中在少数论文身上，存在不少重复研究现象。对梁启超文献学的研究，应该说是从对其目录学的研究开始的，陈光祚的《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武汉大学学报》，1963 年第 4 期）是对梁启超的文献学（目录学）的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对其目录学的研究的奠基之作。陈氏认为，梁启超的目录学活动对近代目录学新面貌的产生起了发凡起例、开拓局面的作用。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梁启超的目录学活动及其思想。第一，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梁氏的主要目录学实践活动及其研究成果。从早期的《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到晚年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对每一种目录学著作的成书背景、成书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客观地反映了梁启超目录学思想的发展流变过程。第二，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目录编制的新方法。一是梁氏主张“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作为宣传图书、指导阅读的推荐书目的编制方法。二是《西学书目表》提出了新的图书分类体系，将图书类分为学、政、杂（教部除外）三大类，成为后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划分的雏形，从而冲击

① 按：此处的统计数据截止到 2007 年。

了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体系，为近代新分类法的输入和产生，打开了局面。三是提出目录学应具有详尽、准确、严谨的科学态度，主张目录学对于图书要“全收无遗”、“一一详载”、“辨别真伪”、“抱残守缺”、“搜采遗逸”、“设立存目”等；同时，反对“爱古薄今”，主张目录学的重点应该放在新书和现存之书方面。四是总结了我国目录学史上史家目录学、读书家目录学、藏书家目录学及目录学家目录学的对目录学性质作用的基本观点，将它们进行综合和系统化，从而提出了较全面的见解。第三，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梁启超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一是梁氏编纂的《西学书目表》等，加强了目录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提高目录学的社会作用；二是扩大了目录学理论研究和目录工作的领域，把佛经目录^①作为中国目录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从梁启超开始的；三是对目录学的新方法进行了一些尝试，《西学书目表》的分类是中国资产阶级用新的知识体系类分图书的最早创举。不可否认的是，陈文带有阶级分析的观点，对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有所批判。

20世纪80年代前，对梁启超目录学的研究只有陈光祚一篇文章。而80年代至今则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对梁启超的目录学的整体论述和对《西学书目表》的研究上。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摆脱了陈氏阶级分析的观点，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梁启超目录学的成就，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基本上没有超出陈氏的论述范围。可喜是，有一些文章在局部的研究上有所推进，如关于《西学书目表》的成书时间和版本问题、梁启超的佛经目录和国学目录研究、梁启超目录学的文化内涵等。

关于《西学书目表》的成书时间，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

① 关于这一名称，学界有两种说法：一是“佛经目录”，一是“佛教目录”。笔者认为，“佛经目录”的说法相对科学，因为毕竟是“佛经”的目录，而不是“佛教”的目录。因此本文统一用“佛经目录”。